

■新作聚焦

阿来长篇新作《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

历史如此尖锐地通向现实

□梁鸿鹰

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正如莎士比亚所说,历史就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我们与自己的民族、国家共同从历史中走来,又创造与累加着历史。因此,历史是通向现实的,文学就是要抵制遗忘,为我们从历史中寻找更多的现实启示提供支撑。时光的推移不断消磨、掩盖甚至泯灭着历史的真实,增加着真相书写的难度。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曲折。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松赞干布、文成公主,除了宗教人物班禅、达赖,细节与详情被历史烟尘所笼罩者是大量的,阿来的《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无疑填补了空白。

因为在汉与藏、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历史长河中,“瞻对”犹如一块未被触碰过的铁疙瘩,长期被幽闭于黑暗之中,散落在档案和小范围自我循环的史志资料中。写作《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缘于阿来实地考察调研的习惯,更缘于他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思考。在开始动笔写一部涉及当下时代汉藏文化冲突及其表现的现实题材小说时,阿来翻了一些旧书,感慨良多。他发现,现实当中发生许多新事情也都是由旧套路导致的,“所谓现实题材,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书写的时候有新鲜感,但写着写着,发现这些所谓新事情,骨子里都很旧,旧得让人伤心。索性又钻到旧书堆里,来寻着踪迹写旧事。又发现,这些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只不过主角们化了时髦的现代妆,还用旧套路在舞台上表演着”。

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正如洛夫所说,“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作家是有责任的。瞻对位于康巴藏区,在现今四川甘孜新龙县一带,一问到“瞻对”是什么意思,当地人都会自豪地说是“铁疙瘩”。有位叫喜饶降泽的高僧,曾于公元1253年随八思巴进京觐见元世祖忽必烈。传说他在皇帝面前显示法力,将一把剑徒手挽成了一个铁疙瘩。忽必烈赐他官印,令他回家乡为官。但喜饶降泽回乡后仍入寺修行,由其姐姐行使地方统治权,地面上便兴起一个地位尊贵的家族,藏语名叫“瞻对本冲”,意思就是因挽铁疙瘩而得到官位的家族,其管辖之地从此被叫成了“瞻对”。这个清朝雍正年间只有两三万人的地方,却享有清朝政府次级对之开藏,且每次用兵都不少于两万人。民国年间,此地的归属权在川藏双方相互争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中摇摆不定,这样的对抗为何竟持续了两百余年?人们颇伤了一些脑筋。这里固然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当地人性格彪悍、难以制服,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落后的时代、落后的社会制度,以及长期形成的盲目“尚武”等习气。民国后实行改土归流,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便将此地解放,瞻对这个“铁疙瘩”轰然融化。阿来对这一素材的触碰,使瞻对及围绕汉藏问题的关键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是一次与遗忘的较量,更是一次对时间的抵抗。

阿来试图从人文的角度认识历史,认识现实,他以对某一个地方微观历史的透彻挖掘,见微知著,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补白疑问,搭建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连接点的发现、完整世界图景的搭建,得自扎实的知识储备与史料研读,当然更少不了独特的眼光。《瞻对》呈现的是两个方面的成果,一方面是作家通过对大量档案、史料的深入挖掘,以生动的笔触、丰富的细节、扎实的内容,还原与再现始于雍正八年、长达两百多年的“瞻对之战”中藏地与清政府方方面面的表现与表演。另

一方面,则是阿来的独有发现与解读,这一部分融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构成了作品的肌理,是有温度、脉搏与节奏的。

这样的写法使得文本不流于对事实的堆砌,更无对写作者本人博学、勤奋的炫耀,而是实实在在地透过历史尘埃,有独特的发现,有从容中的睿智。他对清政府政治、军事等方面作为的感悟,从历史风云中来,有力造纸背的精彩。比如对1746年敢于瞻对的那一战,乾隆皇帝在与军机大臣等总结大军欲进不能,退亦不可,以至师老兵疲时候,认为原因有3条:一是敌敢,“以为瞻对蕞尔之地,大军压境,必如沸汤扬雪”。领兵大员并未把雍正年间大军征讨无功而返的前车之鉴当回事。二是缺少调查研究,情况不明胆子大,率尔出兵。三是“事有不顺,这些体制中的负有重责的官员便隐瞒事实,谎报事功。谎报扯越大,事越来越烂。”皇帝作为那个社会体制的总管,当几乎所有官员都在撒谎、捏报事功的时候,自己明明什么都清楚,却不能对所有官员都下手,“只好祭出杀鸡儆猴抓典型的官场老把戏”。再看那些参战的兵卒,早已没有了开国之初能征惯战的精锐之气,他们在盛世华服的遮掩下日渐衰败腐朽,要么兵丁病孱,要么“器械锈坏者,不知更换。”这样发展下去,果然到了中日甲午海战,“炮弹里没有火药,而是装满了沙子了。”

而在历史上,这些事情反复出现,当然应该有更多的原因需要探究,阿来为此同样做了认真分析。比如从全国范围讲,地方豪强依靠武力与阴谋等争夺人口与地盘,壮大自身实力,而不知兴办教育、改进生产技术、扶持工商等,为此策划于密室,劫财夺命于光天化日,在传统中培植出庸俗强梁的风气,不同家族间结仇、复仇,仇仇相报。“有一清一代,这些行为都被简单地认为是不断听奉,犯上作乱,而没有人从文化经济的原因上加以研究梳理,也没有尝试过用军事实力以外的手段对藏区土司地面实施计之长久的治理,惟一的最后的手段就是兴兵征讨。”就川边藏区而言,因地域辽阔,部族众多,当地豪门各自拥兵割据,中央政府根本无力进剿压服。

再比如那个贡布郎加,即“布鲁曼”,当地历来视他为大英雄,他的传说老一点的人都能讲出一些,荤的、素的,人间的、僧界的,五光十色、林林总总,就连体面的酒店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对他抱有巨大希望的阿来,在追寻其故事过程中发现,这个所谓一世英雄的布鲁曼终于也未未能超越时代,只不过“他比前所有的豪酋更蛮横,更顽强,更勇敢,更有计谋,更残酷”,却也更加不识时务,不知天下大势,不曾有半点改变社会面貌的愿望,最终同样要在历史的因循中重蹈覆辙。“阴谋、进攻,对神盟誓然后又违背誓言、杀戮……种种手段都是老而更老的桥段,都在旧框架中习惯性运行。”

那么,历史是如何通向现实的呢?恩格斯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阿来的写作没有离开过西藏历史,更密切关注着今天,他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写作者,更是一个审视者、发现者,他关注着当下藏区的一切——其社会生活、文化生态,以及在时代风气之下那些似乎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东西。他发现,无论是变动的还是稳定的,无论是表面的还是暗地里的,其实一切都有渊源,现实的一切与与历史都有惊人的连接,要么是现实延续了过去,要么是过去还魂于今天,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历史,也没有无本之木的当下,审视与发现问题,是阿来写作时一种常有的状态,同样是《瞻对》的一个核心。

出色的写作应该触及心灵,成为挖掘精神向度的实践。无

论对作家,还是对读者,《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的意义不单表现在对真相的揭示与探求,更表现在对民族心态、精神的触摸。阿来通过瞻对旧事寻踪觅迹的考察发现,“诸多陈年旧事,映照今天现实,却让人感到新鲜的警醒。看来,文学之新旧,并不像以新的零碎理论包裹的文评家们所说,要以题材划分。”阿来准确把握历史的事实,走向与趋势,体现出他综合把握民族、文化、宗教、军事、历史等多方面问题的能力。

文学的目的固然在于抵制遗忘,其职责更在于提醒今人。历史的列车呼啸而过,无数的旧事或被湮灭、或被发掘,阿来在纸页、口头或人们心目中的旧事里发现了大量的“新事”。比如,我们历史上的“铁疙瘩”在今天是不是就没有了?从日常生活表面来看,社会生活在如愿前行,这里修了公路,人员来往、贸易空前便利,建筑上进行了美化处理,环境更现代,更“亮丽”了。被誉为精神殿堂的各种寺庙得到了空前的修缮、提升,人流如织、香火日旺,关于雪山灵兽,关于种种神迹的传说,人们笃信不疑、口口相传,而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的金碧辉煌的寺庙里,人们是在那里向佛、向善,还是凑热闹、撞大运?或者,干脆就成了怀着“不可告人”的内心企求者的庇护所?还有,庙很多但僧很少,原因是他们为了利益而云游四方。阿来说,“如果革命是指种种新的变化,那我更期待人心内部的革命。”

那么,人心内部的革命,到底有还是没有呢?实际上,无论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国民的灵魂中,因循的东西、抱残守缺的东西,瞒与骗、蒙与混等种种劣根性的表现还很多。今天的中国在发展进程中,有很可以炫耀的亮色,也有很多让人无奈的眼眶。阿来认为,“我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只要这个国家发展,所有的社会问题就会在发展过程中烟消云化,迎刃而解,但其实并没有这样,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民族主义的高涨。”阿来觉得自已时常在遭遇这些问题的困扰,他带着问题一再追索,走进历史、踏入田野、访在民间,去观察这些情况如何发生,又何以会发生,《瞻对》就是这样来的。

他的一些疑问是从探寻中得到的——怀着很强的忧患意识。比如,他觉得当代有知识的人们很善思考,也很有雄心,“今天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眼光经常向外看,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自己国家发生的很多现实问题,到底要怎么办?”他觉得,从历史上看,改革一直是个很难破解的课题,“看中国历史,于国计民生都有利的改革,总是不能在最容易实行时进行,原因无非是官僚机构的怠惰和利益集团的反对。最后,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可是,已经太晚了。哗啦啦,大厦倾倒了。”再比如,历史的巨轮隆隆地开过去,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作用是什么?其作用的发挥与后人的评价,又是什么样的关系?阿来说,“中国社会,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干一番大事,住住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反而时时被吹毛求疵。但这个社会同时又极欢迎别人成为烈士。一旦成为烈士,又惟恐其人格不完美,愿意随时替这个传奇增添动人的细节。”所有这些均发人深省。

这是一个异常精彩的文本,作者能够深入历史,又思考历史、返回现实,深入浅出、稳健多姿,阿来认为写作到紧要之处,宕开一下,着些闲笔,为增强悬念,也为了文本信息的丰富。再有,作者游刃于丰富多歧的民间文化资源里,把握历史脉搏,解密、还原历史真相,力避浮躁、浮泛,让饱满的细节、清澈的思考、灵动的表述、顾盼生姿的语言成为特色,为当今的文坛增添了新的经验。

没有说的才重要

——评陈幻长篇小说《危险》

□黄昱宁

能将悬念一路护送到最后,临了躲在边上

看读者镜片碎一地之外,某种程度上,也是不给凶手、受害者以及当事人太多博取同情的机会。作品的立场与态度上处于一个正义的位置,读者跟着这样的故事走,虽然始终悬着一颗心,在心底深处倒是安全的。他们知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最后自然会有善恶扬善大结局——因为作者要保证你始终情绪高昂地投入那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智力游戏中。

但《危险》从一开始就在催促你从这个安全地带中撤离出来,它试图在月黑风高、刀光毒影都晃过一圈之后将肉体杀戮降到最低,而将心理层面的“危险”放到最大。在一些轻巧自然的段落,作者借杨晋之口,有意无意地扯到几句“与本案无关”的事件,

既让故事的社会背景得以延伸,也在暗处策应主旨:人心的危险无处不在,谁都甭想轻易把自己择到局外去。

小说中那些试图挣脱类型小说的主体部分,挨个深入3个当事人心中,捕捉其内在视角,同时标注他们每个行动的心理动机。这种写法曾经被亨利·詹姆斯推到登峰造极,如今实在不能算时髦。这样写的不足之处是看起来不够酷、不够“冰山”。心理描写太多,延宕了故事节奏,对习惯于动作及场景迅速转换的当下读者来说,容易构成轻度困扰。同时,写作难度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升级——所有人的心理独白都展现在读者眼前,甚至氰化钾是怎么进入“凶手”的计划得写得一清二楚,又如何将悬念维持到最后呢?

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立传

——读贾松禅长篇历史小说《大汉将军李广》

□李星

行屡受挫折。在李蔡广置田产住宅时,李广即以皇帝近臣武卫的显要地位拒绝一切不义之财,乃至家无余资,仍住在成纪的乡下。当李蔡说服他接受那些贪官财富“九牛一毛”的贿赂,并授以“四不受”之要诀时,他却断然拒绝。究之于史实,这也是符合李广、李蔡两兄弟的历史和性格真实的。

其三,围绕李广起伏跌宕、英勇悲壮的一生,小说描写了西汉初年从吴楚七国之乱,到与北方匈奴打打和和、和和打打,直到汉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带来有汉以来长期少有的边境和平。小说涉及汉文成、景帝、武帝到灌婴、灌夫、周亚夫、晁错、枚乘、袁盎、程不识、卫青、霍去病、张骞、韩王信、邓通、吴王刘濞等著名的历史人物形象,呈现了所谓“大汉雄风”。李广虽然阴阳错始终未得“封侯”,但他与同时期的三代皇帝都对他的才能和品质十分赞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做到了识才善用。他的自杀,是生性骄傲的他对自己军人尊严的维护,也是对部属的保护。轰轰烈烈的生是许多伟

大人物都能做到的,但庄严而自尊地“死”却不是所有伟大人物都有勇气选择的。李广是有勇气的,这为他带来了当时与后世的无限敬仰,正如司马迁所云:“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并留下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千古名言。

与对汉王朝军事、政治历史的广阔展示相一致,小说对匈奴王庭历史、风俗、文化的表现也是相关历史小说中所罕见的。它不仅写了从老上单于粥靡到军臣单于代逐的斗争,还写了伊稚斜单于与单于叔侄争位的阴谋和血腥,表现了汉匈两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血肉关系。特别是对游牧民族的性格、草原风光、萨满巫术等边地文化,也做了生动而具体的描绘,这些都得益于作者在西北边地多年的军旅生涯,以及对蒙古、藏、回、裕固、东乡等民族信仰风俗的熟悉和了解。

同代大臣对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的评价或许是恰当的。他喜欢冒险,这冒险也常常成功,但却与战争大局未必

■关 注

有关中学语文新课改、新教材的话题一直备受热议。新教材收入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和《奥斯特辛没有什么新闻》,是加强人文教育;收入巴金的《小狗包弟》,是爱的教育;收入霍金的《宇宙的未来》和《飞向太空的旅程》,是科学与幻想的教育;此外,“酷”、“爽”、“帅哥”、“辣妹”、“闪客”等流行词语,都成为学生探究的内容,这是与时俱进。所有这些努力,都值得肯定。

新教材中,鲁迅的文章少了许多。据说,“鲁迅作品很经典,但学生不易读懂”。自古以来,读书都是苦的,读书又叫“啃”,如果都没难度,一读就懂,那还叫读书吗?还叫“啃”吗?文言文比鲁迅的文章要更难懂,是不是也应该都抽掉呢?鲁迅被抽下的都是具有启蒙意义的作品,多有五四精神。《药》拿掉了,记着秋瑾干什么?启蒙干什么?《为了忘却的纪念》,既然要忘却,还纪念什么?鲁老夫子这不是矛盾吗?殷夫高唱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译诗为什么就不被选入中学课本呢?——“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抛弃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抛弃了兄长为他安排好的荣华富贵,为了自由,走上了赴死之路。现在,我们的教材却要“别了,殷夫”!

这些争自由的志们,鲁迅要“纪念”他们而不可行。忘却,足可以让“五四启蒙”和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成为无人问津的、尘封的历史。外星人要征服地球,从《机器报务人》到《怪城历险记》,这些科幻小说有共同的手段,那就是用诸如“欣慰剂”之类,让人类遗忘、忘却,忘却了一切可忘却的。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的结尾写道:“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我们正是鲁迅的“将来”,“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们的孩子却正在品尝着爱情美文等“欣慰剂”时,在“被忘却”。

新教材里,戴望舒的经典诗歌《雨巷》过去是学生自读的内容,现在成了必修教材。专家声称,“这种表达爱情的主题过去是不能进入教材的,这首诗此次入选高中教材,能使更多地了解什么是人性和真情”。是的,爱情是美好的,戴望舒也是我所喜欢的。可是,我隐约觉得,《雨巷》的婉约有其某种接近忧伤的东西,有点阴郁,不够阳光,健康美好的爱情诗多如牛毛,应该有比《雨巷》更好的可选。

网络上,在谈爱情诗入选中学课本的好处时,有一个网友跟贴说,“在西方国家,老早就有爱情的教育,比如,他们的《爱的教育》就是中学生必读的课文”。《爱的教育》是一本书,而不只是一篇课文。这倒提醒了我们,爱的教育与爱情教育本不是一回事。国外的朋友告诉我,在欧洲,课本中纯种的爱情诗也少而不少,倒是有很多爱心教育的文章入选,《爱的教育》中的文章是经常被选入中学课本。爱的教育、爱心教育,不能被片面理解为爱情教育——虽然爱情教育也是爱的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语文课固然也可以理解为写作课,它要培养学生的写作技能,但是,更是一门人文教育课,世界眼光、人文情怀、忧患意识是要考虑的;悲悯、博爱,爱地球、爱他人、爱人类之外的一切生命——“爱的教育”——也是要考虑的;科学精神、创造能力、幻想思维也是要特别关注的。

好在,人心的“危险”最终挽救了这种“危险”的写法。再度借杨晋之口,作者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你知道,有种人撒谎很高明,他有选择地告诉你一些,绕过重要的部分,说一些次要部分,次要部分的确是真实的,他可以说话有声有色,让人误以为他说了全部的真实。也的确没撒谎,只不过,没有说的才重要。”

没有说的才重要。这不适用于“有种人”,也不仅适用于小说。它不仅触动我们每个人最脆弱、最隐秘的神经,也是作者的小说和叙事艺术。惟其如此,心理描写本身才可能成为小说里最大的障眼法和悬念助推器。惟其如此,透过看上去有点啰嗦、无比纠结的心理分析,你能够看到每个人物都在回避的最重要的东西,而小说也在有意识地绕开直奔主题的捷径。至于这种绕开的程度是否足够?留白若是更多,会让文本更高级还是反而弄巧成拙?结尾是否可以更开放,将“心理危险”贯彻得更彻底?我也说不准,那也许就是另一部作品,也许就是陈幻的下一部。

有益。在撇清卫青对李广之死承担责任时,作者贾松禅是客观而清醒的,但他究竟没有走出司马迁的情感和视阈,没有赋予小说以新的思想光亮。其实,司马迁并没有为了私谊心怨而背弃事实,篡改历史,他肯定的只是在裙带之风甚行的封建官僚体制下,作为平民子弟,李广的努力和贡献,他清白无瑕的人格,他在官僚体制和权贵阴影下的悲剧命运。《大汉将军李广》在回答“李广难封”的总题目下,实际上已触摸到司马迁的愤怒,只是对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尚缺乏进一步的展示和描绘。

早在1934年,鲁迅在批评当时弥漫于社会的“自欺力”的同时,曾肯定地指出: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等于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盖不了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李广就是为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在当前中国的现实背景下,以文学的手段,重塑李广的形象,张扬李广的品德风范,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对人文教育的一点思考

□房向东

■新作快评 路内长篇小说《天使坠落在哪里》《人民文学》2013年第10期

路内的长篇小说《天使坠落在哪里》讲述了一个飘荡着成长的梦。相比其他“70后”作家张扬自我的锋芒,路内的作品多了一点内敛,相比人们习惯了的残酷冷漠的态度,路内则多了一点温情。在小说里,路内用他特有的叙述方式,用他一贯幽默而感伤的笔调,向我们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在时代的洪流下,三个小青年各自不同的成长历程。整个小说以一个福利院孤儿的经历贯穿始终,用路小路

的视角,勾勒出他看到的每一个善良的人是怎样被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打下深深的烙印。故事发生在戴城。路小路顾世不恭,失业又失态后投奔女杨迟,在照顾因鼻息入院

的女婴,使得杨迟萌发了认养一个孤儿的想法。大学毕业后,杨迟回到戴城,成了戴城农药厂的金牌销售员,同时认识了北京化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农药厂的小苏。路小路、杨迟和小苏一拍即合,在杨迟认养福利院的孤儿戴黛后,他们和戴黛建立了一种纯真的情感,但现实迫使孤儿戴黛只能被送去美国,由美国人花1000美元收养,和路小路等人永远分别。

路内用《天使坠落在哪里》给他的这部作品命名,隐含着深远的寓意。小说中的路小路、杨迟和小苏分别代表着三种人的青春历程。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路小路选择了消极抵抗,冷眼旁观。杨迟选择了奋力拼搏,在光怪陆离的农药厂里,忍受无能阴险的上司欺压,承受自私利同事的坑害,冒着生命危险去收账,结果被绑架、勒索,差点丧命,最后回到农药厂却被无情地开除。同时,他视为精神寄托的戴黛也离他而去。于是,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投入了昔日恋人的怀抱,成了现代化都市里所谓的“白领”。小苏是个十分契合时代发展的典型人物,尽管曾一度受制于农药厂的制度,曾一度被女友“逼宫”,但他用妥协的方式处理了农药厂对他的羁绊,凭着自己的隐忍,与女友走进婚姻的围城,淹没在俗世里。

小说用荒诞不羁的故事充分展示了“70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把他们迷茫困顿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们在与现实对抗的同时并没有丧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戴黛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当他们在现实世界里被撞得头破血流时,惟有从戴黛那里才能寻找到一丝安慰。只要他们向时代低头,封尘心底的真实自我便能立足于现实世界。但像戴黛这样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的天使般的孩子,他们该如何立足于时代?在广袤而博大的国度里,他们竟连一个安身之处都没有,仅仅1000美金就令他们失去了根,漂泊异邦。

小说最后,路小路继续着浑浑噩噩、前途未卜的生活,他徘徊在戴城东郊货运站的月台上,远望着已经面目全非的现代化戴城,不知要去哪里。

■短 评

给天使一个安身之处

□尹东